

Zanotti, G. J., & Cachanosky, N. (2015). Implications of Machlup's interpretation of Mises's epistem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37(1), 111–138.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马赫卢普对米塞斯认识论的诠释的含意*

加布里埃尔·萨诺蒂 (Gabriel Zanotti)

尼古拉斯·卡查诺斯基 (Nicolás Cachanosky)

摘要

我们认为，Machlup (1955)对米塞斯认识论的诠释至少与 Rothbard (1957)的诠释一样合理，如果不是更合理的话。马赫卢普对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认识论的诠释，影响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相互关联的方式。马赫卢普的诠释表明，奥地利学派认识论在后波普尔主义 (post-Popperian) 认识论中有着很好的基础，大多数基于其先验特征的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批评是不得要领的。此外，马赫卢普的诠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环境，以重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互动——这种学术互动是 20 世纪初的特征。

1. 引言

不论在其追随者还是在其批评者那里，对米塞斯的认识论的最广为流传的诠释是罗斯巴德 (1975) 的极端先验主义 (extreme apriorism)。根据这种诠释，米塞斯会说经济科学完全是先验的，没有任何空间留给不能从行动学中直接推导出来的辅助假设。¹这种诠释如此普遍，以至于 Blaug (1980, 81) 在一篇已成为经典的尖锐批评文章中说：“在 20 世纪 20 年代，米塞斯对货币经济学、商业周期理论，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后来关于经济科学基础的著作如此古怪，如此武断地陈述，我们只能怀疑是否有任何人认真地对待过它们。”

由于哈耶克 (1967) 在认识论方面的工作，并非所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遵循罗斯巴德的极端先验主义立场，许多人正是在这一点上将米塞斯与哈耶克区分开来。然而，仍然很常见的是，米塞斯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主要遵循罗斯巴德的诠释，而很少关注 (或根本不关注) 其他作者，例如，为米塞斯的认识论提供了替代性诠释的马赫卢普。²一个例子是 Caplan (1999)，他将米塞斯-罗斯巴德范式标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方案。³马赫卢普 (1955) 的诠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它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我们所

* 我们感谢 Bruce Caldwell、Douglas Rasmussen、Troy Camplin 和三位匿名裁判的评论。我们还要感谢 Peter Lewin 和 Troy Camplin，他们帮助我们以比最初更清晰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论点。任何错误或遗漏都是我们自己的。

¹ 例如，参见 Doherty (2007, 第 2 章) 中的处理。

² 与我们不同的观点参见 Maclean (1980)。

³ Block (1999, 2003)、Caplan (2001, 2003) 和 Hülsmann (1999) 继续辩论。罗斯巴德的名字在这些论文中出现了无数次，但没有一篇提到马赫卢普的名字。

说的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指主流经济学，而不是其他非正统的方法）中都没有受到注意。⁴据我们所知，Koppl (2002, 第2章)是唯一一个例外，它对米塞斯的认识论提供与我们相似的诠释。并不是马赫卢普的论文本身遭到了忽视和遗忘，而是马赫卢普的诠释（即米塞斯并没有采取极端先验的立场）在一篇论文中被忽略了，而这篇论文发展成为了80年代前经济文献的经典之作，并据说推动了拉卡托斯对认识论的一些贡献（Langlois and Koppl, 1991）。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尝试在使用拉卡托斯的研究计划重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认识论，但这一事实仍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诠释与罗斯巴德的大相径庭。我们的论点不是Machlup (1955)的陈述从表面上看是米塞斯立场的代表，而是米塞斯不是一个极端先验主义的思想家，以及马赫卢普的工作在米塞斯和拉卡托斯之间架起了一座尚未被探索的桥梁。⁵

罗斯巴德的文章是对马赫卢普的文章的直接回答——马赫卢普说米塞斯和其他先验主义经济学家都不是上述定义的“极端先验主义”。事实上，罗斯巴德的文章《为极端先验主义辩护》（*In Defense of Extreme Apriorism*）的标题是对马赫卢普的论文的直接隐射。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诠释应该与罗斯巴德的诠释并驾齐驱，而不是后者是对米塞斯的默认诠释。⁶

因此，存在着两种事前（*ex-ante*）同样合理的对米塞斯的诠释：马赫卢普和罗斯巴德。前者是**适度先验主义**（*moderate aprioristic*），后者是**极端先验主义**。我们承认，如果从米塞斯的整体工作的背景之外来看，米塞斯的一些段落从表面上看可以指向任何一种诠释。然而，中立的学术立场是将马赫卢普的诠释视为进入米塞斯认识论的竞争窗口。不管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是对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将马赫卢普的诠释接受为合理都有着重要的含意。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来说，这意味着米塞斯、哈耶克和波普尔之间的关系比通常认为的更密切。对于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来说，对米塞斯的更为平衡的评价表明，布劳格的文章所代表的批判立场是基于对米塞斯的误读，并且奥地利学派和非奥地利学派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比任何一方通常接受的更接近。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解读，其含意超越了经济思想史上的诠释问题；它定义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如何相互关联。

第2节介绍了马赫卢普的方法论和他对米塞斯的解读。第3节讨论了接受马赫卢普的诠释作为对米塞斯思想的合理诠释的含意。第4节是总结。

⁴ 例如，Egger (1978), Hoppe (1995), Hülsmann (2003), Nozick (1977), Rizzo (1978)和 Stringham and Gonzales (2009)参考了罗斯巴德的论文（该论文是对马赫卢普的回复）或者罗斯巴德的另一篇关于方法论的文章，但没有一篇提到马赫卢普的论文。Caldwell (1984) 和 Powell and Stringham (2012)提到了马赫卢普，但认为罗斯巴德是更密切地关注米塞斯的行动学的人。Koppl (2002, 第2章)和我们一样，将米塞斯和马赫卢普更紧密地放在一起。

⁵ Rizzo (1982)试图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重新表述为拉卡托斯方法论。Leeson and Boettke (2006)认为，马赫卢普是那些试图与米塞斯的先验主义保持距离的人之一。Backhouse (2000) 搁置了在拉卡托斯框架中展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做法，但展示了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些作者都没有参考马赫卢普的论文。

⁶ 罗斯巴德和马赫卢普都是米塞斯的学生，并直接接触过他的思想。

2. 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诠释

2.1. 马赫卢普的科学哲学中的“先验”

2.1.1. 非否定 (*The non-disconfirmation*)

与 Hempel (2010) 和 Popper (1974, 1983) 一样, 对于马赫卢普来说, 很明显, 在假设演绎模型 (hypothetical-deductive model, 以下简称 HDM) 中, 肯定后件并不能证明假设。即, 如果 p 则 q , 则肯定 q 并不意味着 p ; p 是自 q 的不当推论 (p is a *non sequitur* from q)。 q 可能有除 p 以外的其他原因。对于 Machlup (1955, 4) “缺乏相互矛盾的证据 (发现不矛盾) 实际上是对否定的否定: 事实上, 当一个假设只是未被否定的 (merely not disconfirmed) 时, 人们会称它为 ‘确定的 (confirmed)’。”这就是为什么马赫卢普会谈论理论的 “例释 (illustration)” 而不是 “经验检验 (empirical testing)”。

这并不意味着验证我们的经济理论的所有尝试都完全失败。但这确实意味着, 对我们大多数理论的检验, 其特征将更接近于例释, 而不是验证与可重复的受控实验或反复出现的完全确定的情况有关的那种可能。这意味着我们的测试不足以令人信服以迫使人们接受, 即使该领域的大多数理性人应该准备接受它们是结论性的, 并认可如此测试的理论是 “非否定的”, 也就是说, 是 “好的”。 (Machlup, 1955, 19)

尽管一些当代前波普尔主义者 (pre-Popperian) 尝试过几乎证实的 (almost-prove) 假设, 但马赫卢普已经假设了这个问题已被解决。

我相信, 到目前为止, 我所说的一切都不会受到任何现代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家或科学家的反对。虽然所有的点都曾经有争议, 但战斗已经转移到了其他问题上, 只有少数在方法论战场上的落后者和后来者将远古时代留下的瓦砾误认为是当前战斗的痕迹。因此, 我们将继续讨论争议仍在继续的问题。 (Machlup, 1955, 9)

对于马赫卢普和他那个时代的学者来说, 逆向谬误——肯定后件或后此谬误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的含意是一个可以被假定为已被理解和解决的问题。⁷

2.1.2. 从波普尔到拉卡托斯

与亨佩尔和波普尔一样, 马赫卢普也认识到为特定案例和预测赋予意义的一般假设 (general hypotheses) 的作用。Machlup (1955, 2–3) 将此原则应用于社会科学和经济学中的 HDM, 声称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说大多数历史事实都是基于以前形成的一般假设或理论。”但随着对杜赫姆-奎恩理论 (Duhem-Quine thesis) 的拉卡托斯主义转向, 他清楚地表明, 在 HDM 中, 一

⁷ 关于关于假设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的辩论的历史说明, 请参见 Boland (1979), Caldwell (1980a), Hirsch (1980), Musgrave (1981) 和 Nagel (1963)。

般假设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假设，因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进行独立的经验检验。⁸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虽然一个成功的实验不能证明正在评估的理论，但一个不成功的实验不能否定该理论，因为如果没有先验地假设其他假设成立，就无法检验任何假设。马赫卢普接着总结出这一事实，即

没有办法对基本假设进行独立验证，这不应成为干扰的原因。它不会干扰这一学科（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非常尊重和嫉妒其验证机会）的工作者：物理科学。整个物理力学系统都建立在这样的基本假设之上：牛顿的三个运动定律是假设或程序规则，不可能或不需要任何实验验证；而且，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假设可以单独分开测试。”因为，他接着说，“物理概念是人类心智的自由创造，无论看起来如何，都不是由外部世界唯一决定的。”（Machlup, 1955, 9）⁹

2.2. 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诠释

马赫卢普区分了两种极端的认识论立场：（1）极端先验主义和（2）极端经验主义（ultra-empiricism）。根据马赫卢普，极端先验主义仅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存在，而经济学中认识论的历史表明，所有先验主义作者都在追随 J. S. 穆勒（J. S. Mill）。根据马赫卢普，先验主义思想家所想的是先验理论的发展，然后强烈否认对一般假设理论集的独立验证。对于穆勒来说，预测来自于将一般理论应用于特定案例。这样的应用不再只是科学，而是应用科学。对 Machlup (1955, 7) 来说，“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穆勒并没有建议将经济理论的假设用于经验检验，而只是从它们推导出的预测结果。我认为，这就是所有纯粹的、精确的或先验的经济理论的支持者心目中的想法，**无论他们的论点听起来多么具有挑衅性**。他们反对的是孤立地验证基本假设。”在本段的脚注中，马赫卢普（第三次）提到米塞斯，作为这些先验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个例子：

“先验主义推理纯粹是概念性的和演绎性的。除了同义反复和分析性判断之外，它不能产生其他任何东西。”虽然听起来像是“经验主义者”对先验主义立场的批评，但它实际上是米塞斯的声明（同上，38），米塞斯强调“科学的目的是了解现实”，并且“**在把假设引进其推理时**，它要求的仅仅是对有关假设的处理能有助于理解现实。”（同上，65–66）并且他强调，**对假设的选择是由经验指导的**。（Machlup, 1955, 7）

马赫卢普是对的吗？米塞斯的思想能不能用拉卡托斯的框架来构建？有一定数量的段落使马赫卢普的诠释至少与罗斯巴德的诠释一样合理（如果不是更合理的话）。在不试图为马赫卢普的诠释提供“文本证据”的情况下，一些段落可以说明他的诠释并没有违背米塞斯自己的话。首先注意《人的行动》

（64）第 2.10 章（经济学的程序）的开头段落：

⁸ 这是他与 Hutchison (1938) 辩论的中心点。如下图所示，这一点在米塞斯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⁹ 另见 Caldwell (1984b) 中的讨论。

行动学的范围是阐释人的行动的范畴。演绎行动学的所有定理所需要的只是关于人的行动本质的知识。这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因为我们是人；没有人（只要没有在病理学状况上弱化成仅仅是植物人的存在）会缺少这些知识。理解这些定理不需要特殊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经验——无论多么丰富——可以将它们揭示给一个不先验地知道什么是人的行动的人。认识这些定理的唯一方法，是逻辑分析我们对行动范畴的固有知识。与逻辑和数学一样，行动学知识内在于我们；它不是外来的。

虽然罗斯巴德将本段落和其他段落视为对他将米塞斯解读为极端先验主义的支持，但 Machlup (1955, 7)看到了一个“无论他们的论点听起来多么具有挑衅性”的例子。对于罗斯巴德和马赫卢普来说，米塞斯行动学中的“先验”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然而，不久之后，Mises (1949, 65, 强调为后加)继续告诫说：“科学的目的是了解现实。它不是智力体操或某种逻辑消遣。因此，行动学将其研究限制在研究在现实中给定的条件和**假设**下的行动。”

还有其他段落也支持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诠释。例如，在《人的行动》的第2.3章（先验与现实）中，米塞斯坚持认为：“**不能向我们传递关于现实的充分认识**，这并非先验科学体系的缺陷。它的概念和定理是打开通往完全掌握现实的途径的智力工具；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本身并不是关于所有事物的**事实知识的全部**”（38, 强调为后加）。在第2.10章（经济学程序）中，米塞斯坚持认为“对经验的参考，并不会削弱行动学和经济学的先验特征。经验只是把我们的好奇心导向某些问题或从一些别的问题上移开”（65）。米塞斯在接下来的段落中也很明确，他写道（强调为后加）：

劳动的负效用**不是**范畴上的和先验特征的。我们可以毫无矛盾地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劳动不会引起不适之感【……】。但现实世界是由劳动的负效用为条件的。只有**基于劳动是不适之感的来源这一假设的定理才能适用于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与康德的方法类似，米塞斯的先验主义是用于诠释现实的范畴，而不是应用于现实的经济理论。“**经验教导我们**，劳动是有负效用的。但它并没有直接教导。没有现象会自我介绍为劳动的负效用。只有**经验资料，根据先验知识被诠释为人们认为闲暇【……】**是比劳动消耗更可欲的状况。我们从这个**事实推断**，闲暇被视为一种好处（good），而劳动被视为一种负担。但对于之前的行动学洞见，**我们永远无法得出这个结论**”（65, 强调为后加）。¹⁰

如果这些评论不够清楚，Mises (1949, 66, 强调为后加) 用以下话语描述了经济学，马赫卢普在脚注18中引用了这些话语：

经济学并不遵循逻辑和数学的程序。它并非在呈现一个与现实隔绝的**纯粹先验推理的综合系统**。在把假设引进其推理时，它要求的仅仅是对有关假设的处理能有助于理解现实。它在其论文和专著中并没有将**纯科**

¹⁰ 另见 Mises (1933, 14)。

学与其定理在解决具体历史和政治问题的应用区分开来。它采用先验理论和对历史现象的诠释相互交织的形式，以有组织地展示其结果。

这些段落不仅表明马赫卢普的诠释是合理的，而且还对 Rothbard (1957, 314) 的断言，即“他们的方法论观点【米塞斯和马赫卢普】大相径庭”以及“米塞斯教授和‘极端先验主义’在辩论中没有遇到论据支撑”提出了挑战。

除了明确提到经验假设的存在外，米塞斯还告诫读者，经济学论文并没有将纯科学与定理的应用区分开来。这也可以与马赫卢普相一致；虽然纯理论需要采用一般假设——即劳动的负效用，但将理论应用于特定情况需要假设特定的假设或条件。然而，这些假设和先验范畴是相互交织的。鉴于这种复杂性，Mises (1949, 66, 强调为后加) 继续说，“人们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操纵这种奇异且逻辑上有些奇怪的程序需要谨慎和机敏，而不加批判的、肤浅的头脑一次次粗心混淆该程序所隐含的两种认识论上不同的方法，从而误入歧途。”

米塞斯对经济理论经验内容的评论也出现在其他认识论著作中。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中，这种区别已经存在。例如，对于 Mises (1933, 15–16, 强调为后加)，“因为我们为了现实生活而研究科学【……】所以我们通常不介意放弃一个完美的、全面的人的行动体系所能提供的满足感【……】。相反，我们对涉及经验世界中给定条件的较不普遍的系统感到满意。”米塞斯随后提供了许多不能先验推断，但由经验假设的条件的例子。例如，货币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允许个人相互交流的符号的存在。人不是不朽的，而是有着生与死，Mises (1933, 25, 强调为后加) 指出，“时间的流逝是行动发生的条件之一，这是凭经验而非先验确定的。”

在马赫卢普的方法论组织中，有一组被科学家评估为普遍和先验的基本假设 (fundamental assumptions)。理论的例释是将具有一般假设的理论应用于特定情况的预测。但是特定情况的应用需要假设条件 (assumed conditions) 的存在。这种结构与拉卡托斯的结构相似。马赫卢普的基本假设是拉卡托斯的硬核理论 (hard core theory)，马赫卢普的假设条件是拉卡托斯的辅助假设 (auxiliary hypothesis) 和观察理论 (observational theories)。这意味着在马赫卢普那里，此条件推理的前件是一组基本假设加上假设条件：如果 q (基本假设+假设条件) 则 p 。如果要否定它的演绎结果，那么演绎结论就是对整个集合的否定，而不是对特定假设的否定。正是这个陈述在马赫卢普的论文中被诠释为拉卡托斯主义框架。

即使米塞斯在区分基本假设和假设条件时不像马赫卢普那样明确和清晰，但仍有可能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平行关系：一方面，米塞斯的行动学和马赫卢普的基本假设；另一方面，米塞斯的现实世界假设和马赫卢普的假设条件。如果马赫卢普和拉卡托斯有相似之处，那么米塞斯和拉卡托斯之间也有相似之处。有人可能会反对说，米塞斯的真实世界条件比马赫卢普的假设条件更普遍。然而，可以说 (1) 米塞斯的基本假设是由他的行动学 (即有目的的行为)，加上

现实世界的条件（即劳动的负效用），加上他推导出的经济法则所组成的集合，它们交织在一起，将这个一般理论永久应用于历史案例，或者（2）假设条件可能或多或少具有普遍性，并且米塞斯正在使用比马赫卢普提供的样本更普遍的假设条件水平。¹¹例如，劳动负效用的假设比货币存在的假设更为普遍。不管在易货经济中还是货币经济中，都可以假设存在劳动的负效用。反过来，与商品货币或法定货币的存在相比，货币的存在是一个更普遍的假设。这将米塞斯置于与马赫卢普相同的方法论结构之下。还应该指出的是，《人的行动》是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而马赫卢普的文章是一篇在特定方法论辩论中的论文，并附有详细的例子。可以预期，经济学论文中的假设条件比马赫卢普这样的论文中的假设条件更普遍。¹²这一事实，即这些都不能证明或反驳一般理论，与马赫卢普的科学哲学是一致的，根据该哲学，不存在演绎证明，只存在谦逊的非否定——经验数据例释理论，而不是检验理论。应该补充的是，对于马赫卢普来说，这种例释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图 1 比较了拉卡托斯、马赫卢普和米塞斯的认识论。请注意，拉卡托斯区分了辅助假设和观察理论，后两者在马赫卢普¹³和米塞斯中混在了一起。

图 1

认识论结构	拉卡托斯	马赫卢普	米塞斯
假设先验地持有	硬核理论	基本假设	行动学 (有意图的行为)
更多普遍的假设	辅助假设		真实世界条件
更少普遍的假设 ↓		假设条件	观察理论

根据图 1，可以说米塞斯的硬核是有目的的行为（行动学）加上一些一般假设，如时间偏好和劳动的负效用。米塞斯的辅助假设可能是其他不太普遍的经验假设，例如货币经济的存在或任何特定时间存在的制度框架，例如金本位或法定货币。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米塞斯并没有在这些术语上提出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立场，并且，在属于硬核的经验假设与科学家愿意放弃但被认为适用于几乎所有情况的高度普遍性的辅助假设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也有可

¹¹ 参见 Yeager (1997) 的意见：“读者不应误解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不同）称为‘先验’科学。米塞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使用了这个术语。他提到了像上面提到的那些经验公理，那些即使只是在扶手椅上观察也不可避免地显而易见的公理”和 Koppl (2002, 32): “我们已经看到，米塞斯是一个先验主义者。然而，他的立场的核心是松散的先验主义，而不是严格的先验主义。严格意义上，通过康德双重检验的知识是‘先验的’。‘因此，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是区分纯粹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可靠测试，并且彼此密不可分’[...] 松散的先验主义声称我们的许多科学知识并非来自经验或受制于直接经验检验。广义上的‘先验’知识与严格意义上的先验知识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知识都是组织我们更具体的观察的一般知识。在这两种情况下，反例都不能证明知识是错误的。一个明显的反例实际上只是先验知识应用范围之外的东西。拉卡托斯的‘硬核’是松散意义上的先验，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¹² 米塞斯作为维也纳商会顾问的工作可能是米塞斯将更狭窄的假设条件应用于《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和《人的行动》中展示的条件的一个例子。

¹³ 此处原文中误写成了拉卡托斯。——译者注

能是，有时同一位科学家（可能是无意识地）将相同的经验假设视为硬核的一部分，而其他时候视为具有高度普遍性的辅助假设。什么被认为是米塞斯的核心部分，什么是他的辅助假设的一部分，可能仍会对不同的诠释持开放态度。我们提供的区分旨在举例说明米塞斯的思想，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在一位没有明确提及这个问题的作者中区分硬核经验假设和辅助假设的唯一合理方法。然而，理解米塞斯的经济理论既包括先验主张也包括偶然主张，是理解他的认识论和方法的关键。

为什么对米塞斯的两种诠释（极端先验和适度先验）都有空间？这是三个特征的结果。第一个是，如果脱离其著作的一般背景，米塞斯的一些段落可能是矛盾的。第二个是，米塞斯没有明确区分假设的不同程度的普遍性。通过将基本条件和假定条件捆绑在一起，米塞斯认识论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可能是正确的，这取决于对先验的理解。第三个是，基本假设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这意味着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立场，它们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后验的，可以自由地以任何一种或两种方式来诠释。¹⁴对米塞斯自己的著作的一种仁慈的诠释，并不是说他在同一章节中谈到经济学的先验知识并立即引入假设，然后反复自相矛盾（正如罗斯巴德的诠释无意中得出的结论），而是说他隐含地在一个类似于马赫卢普的方法论结构下工作。¹⁵

Machlup (1955, 16)认为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在社会科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属于这一范畴。理想类型和行动的意义在米塞斯的认识论中也起着核心作用。¹⁶事实上，Machlup (1955, 17)引用了 Schütz (1953)来让自己和弗里德曼保持距离。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它让人怀疑这一诠释，即马赫卢普是和弗里德曼一样的工具主义者。这表明舒茨的工作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项目，其结果可能与本文的结果兼容。这条研究路线是由 Lavoie (1986, 2011)开始的。¹⁷虽然这种探索需要一种会使我们与本文所采用的方法相去甚远的研究方式，但我们认为值得提出一些见解。

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Schütz and Wagner (1970) 很重要，因为他们通过区分“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来增加诠释有意的、理性的行为的清晰性。¹⁸前者是关于行动者的个人动机，而后者是关于外生观察者所理解的归属目的。外生观察者诠释取决于理想类型。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拥有相同的心理工具——理想类型——来理解他们共享的世界：“如果来自火星的访客进入演讲厅、法庭和教堂，这三个地方在他看起来外表完全一样。三者中没有一个地

¹⁴ 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我们理解以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传统，哈钦森在经济学中相当于这一传统。我们认为马赫卢普超出了这一传统有两个原因：

（1）他的基本假设的哲学基础不同于哈钦森和弗里德曼的哲学基础；（2）他更完善的 HDM 方法版本，这是马赫卢普本人与哈钦森分开的原因。

¹⁵ 参见 Mises (1962, 4)：“行动学的先验知识与数学的先验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与逻辑实证主义所诠释的数学先验知识）完全不同——范畴上地不同。所有行动学思维的出发点不是任意选择的公理，而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充分、清晰、必然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

¹⁶ Hayek (1948, 第 30 章), Koppl (2002, 第 2,4 章), Lewin (1997) and Mises (1933, 第 3 章, 1949, 第 II.9 章), Koppl (2002, 第 2 章)和 Mises (1949, 第 II.9 章)。

¹⁷ 另见 Koppl (2002, 第 3 章)。

¹⁸ 另见 Schütz (1967)。

方的内部安排能让人理解主持官员的意图。但是让人告诉他，一个是教授，另一个是法官，第三个是牧师，然后他就可以诠释他们的行动并确定他们的动机。”（Schütz and Wagner, 1970, 197–198）

出于这个原因，Schütz and Wagner (1970, 282) 将自然现象与行动者赋予其行为意义的社会现象区分开来：“相反，我们想要理解社会现象，但只能在人的动机、人的手段和目的、人的计划的体系中——简而言之——在人的行动范畴内理解它们。”

例如，当米塞斯将货币定义为“间接交换”的手段时，他指的是行动的“客观意义”，只要交换不以直接消费为目的，而是交换的对象是用于后来的交换。一种财货作为货币的表现不是因为物理的内在品质，而是因为所涉及的参与者所赋予的意义。因此，舒茨有助于将米塞斯的行动学纳入诠释学

（hermeneutics）和德国现象学（phenomenology），尤其是胡塞尔（Husserl）和伽达默尔（Gadamer），而无需依赖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可能阻碍了拉沃伊的崇高计划）。

2.2.1. 关于罗斯巴德的“极端先验主义”的简短说明

罗斯巴德《捍卫“极端先验主义”》的论述有两点简短的评论。首先，罗斯巴德在他的文章开头明确指出，马赫卢普并不代表米塞斯的立场，而且，他几乎没有提到米塞斯。然而，他忽略了米塞斯是行动学家马赫卢普引用的作为他将要诠释的方法论的一个例子。重要的不是马赫卢普引用米塞斯的次数，而是在他的文章中，米塞斯被作为极端先验论不是什么的例子提到的特定位置。

其次，在拒绝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诠释并表示他将捍卫极端先验主义之后不久，Rothbard (1957, 315) 继续提到经验假设在行动学中的作用：“实际上，尽管有着‘极端’先验的标签，行动学包含一个可以被称为先验的基本公理——行动公理，以及一些实际上是经验的附属假设。”鉴于假设的存在，Rothbard (1957, 316) 解释说，“决定哪些条件适用于要分析的具体情况是历史学家或‘应用经济学家’的任务。”这听起来类似于马赫卢普的假设条件。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不久之后所说的话，Rothbard (1957, 317) 的立场甚至更类似于马赫卢普的立场：“我们已经看到，其他假设虽然是‘经验的’，但是如此明显和可接受，以至于它们很难在通常的经验主义意义上被称为‘可证伪的’。”¹⁹如果这与马赫卢普还不够接近，请考虑 Rothbard (1951, 944, 强调为后加) 的前一篇文章中的以下段落：“显然，无论是米塞斯还是我本人，都没有引用‘事实来支持他的结论以及公理、假设和逻辑程序。’我引用诸如‘美元缺口’之类的事实不是作为证明或测试，而是作为（现代）历史情况下行动学规律运作的例释。”如果罗斯巴德承认辅助假设的作用，为什么他支持极端先验主义？承认辅助假设的作用与基本假设的认识论基础问题不同。在这篇论文中有两件事我们没有说。首先，我们并不否认行动学硬核中人的行动的公理化特征；我们像罗斯巴德一样，支持辅助假设或条件假设的存在。但这意味着该方法不是极端先验的方法。其次，我们并不是说货币最大化（马赫卢普所使用

¹⁹ Rothbard (1976) 也有类似的表述。

的例子)是中心公理。应该指出的是,关于马赫卢普提到的舒茨的基本假设的问题,人们希望罗斯巴德会认可这一参考,但他似乎错过了。

罗斯巴德言论的困境在于它们使马赫卢普的诠释更加合理。罗斯巴德对马赫卢普方法的拒绝,与他随后的类似但更简单的阐述形成对比,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事实上是否是马赫卢普误解了米塞斯的行动学。我们认为值得考虑的是,罗斯巴德可能误解了马赫卢普,而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通过罗斯巴德误解了米塞斯。

3. 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诠释的含意

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通过马赫卢普过滤米塞斯的三个含意是(1)米塞斯在科学哲学上比罗斯巴德的诠释所允许的更接近哈耶克和波普尔,(2)奥地利学派和非奥地利学派理论在方法论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以及(3)考虑如果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诠释至少与罗斯巴德的诠释一样切题,那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

3.1. 米塞斯、波普尔和哈耶克:认识论上的朋友还是敌人?

3.1.1. 米塞斯和波普尔

对于 Mises (1949, 31)来说,在社会科学中没有常数,因为个人有目的地行动,而不是机械地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一个苹果可能从树上掉下来,这总是遵循相同的模式,但一个人体苹果会决定何时、向哪个方向以及以何种速度下落。因此, Mises (1933, 13)得出结论,“在历史经验中,我们只能观察到**复杂的现象,而实验不适用于这种情况。**”出于这个原因,对于 Mises (1949, 31)来说,经济学否定了检验理论的实验室方法:“生产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它们的各种因果链交织在一起——无法检验任何理论【因为不能施加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的情况】。”像马赫卢普一样,这并不意味着经验事实对经济理论毫无用处。相反, Mises (1933, 31, 强调为后加)坚持认为“在科学中不能过于谨慎。如果事实不能证实理论,原因可能在于理论的不完善。**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分歧,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理论的问题。**但只要对理论的重新检验没有发现我们的思想有任何错误,我们就没有资格怀疑它的真实性。”

事实和理论之间的矛盾指出了问题,但从实验中仍然无法回答问题是在于理论,还是在于毋庸置疑的基本假设,还是在于所研究案例的特定假设条件。然而,先验范畴和基本假设不接受直接验证。例如,在假设他的样本中没有劳动的负效用之前,研究人员很可能会怀疑他的实验结果。事实上, Mises (1933, 31) 文本中的以下段落以波普尔式的风格开头:“另一方面,一个似乎与经验不矛盾的理论决不能被认为是最终成立的。”²⁰

²⁰ 这里是米塞斯以 J.S. 穆勒为例的地方。穆勒无法在客观价值论和经验观察之间找到矛盾,这一事实导致他在边际革命之前断言,价值论没有什么可以诠释的。见 Stuart Mill (1848, 456):“令人高兴的是,价值定律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现在或任何未来的作者来澄清。该主题的理论是完整的。”

正是在复杂现象中存在相互交织的假设，这使得任何经验结果都可以被诠释为对任何给定理论的支持或反对。²¹例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对大萧条的诠释不同，即使他们共享完全相同的信息，因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数据都面临着充满理论的问题。基本条件和假设条件可能不同，因此每组科学家都将同一事件诠释为对给定理论的支持并作为对其他人的挑战。这种分歧无法通过经验解决，因为差异在于不受每个观点质疑的不同假设，而不是数据的差异。不同的是理解（数据诠释），而不是信息（数据）；是由于不同的（充满理论的（theory-laden））知识，即理论影响了信息的诠释方式。

上述段落表明，米塞斯的立场比仅仅反对使用经验事实来辅助经济理论更为复杂。首先，经济现象的性质不允许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原因可以用马赫卢普的术语来诠释。其次，经验事实与理论之间的矛盾，意味着经济学家需要考虑修正他的理论，而不是直接拒绝经验结果。但是米塞斯在经验证伪方面并没有天真的立场。纯理论、基本假设和假设条件以某种方式交织在一起，使得经验检验无法发现哪个辅助假设被证伪。第三，不存在最终确立的理论，无论这些范畴是多么先验的经济学，不仅因为对基本假设的非否定不是决定性的，而且因为基本假设的哲学基础总是可以讨论的。这不仅使米塞斯比极端先验的立场所暗示的更接近波普尔，而且也支持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解读。

在后来的著作中，Mises (1962, 69–70) 实际上确实提到波普尔认为经济学不能遵循经验证伪处方，即当假设与经验事实相矛盾时必须放弃它。但波普尔的立场比米塞斯似乎意识到的更为微妙和相似（Champion, 2011; Di Iorio, 2008; Sarjanovic, 2008）。Popper (1974, 1983) 明确指出，由于假设和初始条件之间的结合，证伪并不意味着对假设的自动否定。²²例如，Artigas (1988) 将波普尔所说的幼稚证伪主义（naïve-falsificationism）的传播称为波普尔的传说之一。²³此外，波普尔（1957，第4章）对社会科学的处理与马赫卢普和拉卡托斯一致。波普尔的一般猜想（general conjectures）可以诠释为马赫卢普的基本假设，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为假设条件，而预测（prediction）为演绎结果（deduced effects）。

3.1.2. 米塞斯和哈耶克

哈耶克（1948, 33–56）对米塞斯先验立场的批评也促成了对后者的极端先验主义诠释。哈耶克认为，要论证经济走向均衡，需要假设企业家从错误中吸

²¹ 参见 Mises (1933, 30): “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从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中得出相反的结论。”

²² 参见 Popper (1935, 28): “因为总是可以说实验结果不可靠，或者断言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明显的，并且随着我们理解的进步它们会消失。（在与爱因斯坦的斗争中，这两种论据都经常被用来支持牛顿力学，类似的论据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比皆是。）如果你在经验科学中坚持严格证明（或严格反证），你永远不会从经验中受益，永远不要从经验中学到你是多么的错误。”

²³ 比较马赫卢普与考德威尔对米塞斯的诠释的含意（2009, 318）：“过去一年，我和纽约大学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直在谈论方法论，尽管主要关注的是米塞斯，而不是哈耶克。即便如此，任何人都可以从米塞斯主义者变成波普尔主义者，这对我来说似乎很奇怪（这两种观点相差太远了）。”

取教训，这不是先验正确的。²⁴这就是为什么 Hayek (1948, 91) “假设所有知识都提供给一个人的头脑——以与我们假设把它给做解释的经济学家相同的方式——就是假设问题消失，无视现实世界中重要和显著的一切。”在知识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家们需要学习如何正确解读市场，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²⁵当米塞斯坚持市场先验地趋向均衡时，他就假设了特定程度的企业家学习。无论哪种方式，如果学习或给予知识不是先验条件，就是假设条件。²⁶哈耶克的观点增加了这一问题——数据观察是充满理论的，即要知道被观察的人的动的意义。经济数据是个人赋予其行动的结果，并且受制于这些意义。认真对待这个立场的话，并不存在客观数据这样的东西，而经济学家应该谈论经验例释而不是经验证据。

尽管如此，在同一篇论文中，Hayek (1948, 47, 强调为后加)持有与米塞斯相似的立场，他坚持认为“在选择纯逻辑领域，我们的分析可以做到详尽无遗，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发展出一个涵盖所有可能情况的形式工具，**补充假设必须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无数种可能的情况中选择理想类型，因为某种原因，我们认为这些理想类型**与现实世界的条件特别相关**。”

只要向均衡的运动被认为理所当然，那么哈耶克所指的学习假设就是一个基本假设，而不是一个假设条件。然而，相比基于这一理由（即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极端类型的先验，而事实上他隐含地假设学习）而批评米塞斯的立场，因为在米塞斯的基本假设中，他（可能）忽略了学习而批评米塞斯是另一回事。前一种批评意味着拒绝方法论结构；后一种意味着添加一个新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哈耶克将有助于米塞斯的认识论结构，而不是拒绝他的方法。在引自 Caldwell (2009, 323–324)的哈耶克写给哈奇森的两封信中，哈耶克坚称米塞斯认为哈耶克的论文和行动学之间没有冲突：“但我演讲的主要目的是适度地向米塞斯解释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他的先验主义。奇怪的是，不轻易接受晚辈批评的米塞斯接受了我的论点，但坚持认为这与他的观点并不矛盾，这意味着，他仅限于我所谓的选择逻辑或经济计算。”²⁷这支持了这一诠释，即米塞斯没有看到他自己的认识论与哈耶克的论文之间存在冲突，但米塞斯没有像哈耶克那样使用像“辅助假设”这样的明确术语。

这并不是说哈耶克比通常假设的更接近罗斯巴德式的米塞斯的立场，而是说根据马赫卢普的解读，米塞斯的立场事实上至少比哈耶克似乎承认的更接近哈耶克。鉴于米塞斯对哈耶克的回应，似乎米塞斯-马赫卢普诠释比通常的米塞斯-罗斯巴德方法更准确地描述了奥地利学派的认识论。

²⁴ 有关哈耶克论点的总结和影响，请参见 Kirzner (1976, 48–50)。关于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哈耶克见解的处理，参见 Boettke and O'Donnell (2013)。

²⁵ Selgin (1990) *Praxeology and Understanding* 研究了柯兹纳和拉赫曼之间关于市场是否走向均衡的争论。塞尔金也提到了罗斯巴德对马赫卢普的回复，但后者没有被提及。

²⁶ 在他的论文中，Hayek (1948, 第 2, 4 章)几乎可以互换地使用了信息和知识的概念。然而，信息和知识需要在概念上分开。信息是指定量数据，而知识是定性的诠释信息。虽然信息可以是完整的或不完整的，但知识既非完整的也非不完整的。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区别，假设完整的信息并不能解决收敛到均衡的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不同知识的问题。参见 Zanotti (2011)。

²⁷ 另见 Caldwell (2004, 221)。

3.2.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离后波普尔主义认识论还有多远？

3.2.1. 历史转折：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

后波普尔主义认识论的特点是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辩论。虽然这些作者之间的差异肯定是明显存在的，但这些作者也通过连接他们的共同线建立在彼此之上。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设想为一个同质群体，就像设想两个没有共同点的群体（波普尔-拉卡托斯对库恩-费耶阿本德）一样是错误的。辩论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四阶段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两个立场的冲突（Bird, 2008; Carrier, 2012; Nola & Sankey, 2000; Zanotti, 2006, 2009）。

Popper (1963, 66–67) 为库恩的范式和常规科学提供了种子，他认识到科学始于“神话”并且理论建立在明确的理论框架下。波普尔的批评不是针对库恩的范式本身，而是针对他所认为的库恩的相对主义。拉卡托斯的硬核提供了一组明确的假设和先入之见，定义了不同的范式。拉卡托斯提供了库恩范式中缺失的基础。然而，由于硬核是给定的，费耶阿本德指出，不同范式之间的争论是一种说服的行使，而不是经验测试。虽然拉卡托斯确实试图挽救波普尔的可证伪性，而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却没有，但后者拒绝理性并接受相对主义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是有争议的。这些作者对认识论多元化（不同的范式）持开放态度，这与对科学实践持怀疑态度是不同的。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事件被称为“历史转折”，因为它们都将科学史作为科学哲学的主角引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四位作者应该一起被理解为一场不断演变的辩论，但既不是同质的群体，也不是两个对立的群体。

如果米塞斯的认识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参考，并且如果米塞斯很适合拉卡托斯的结构，那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离后波普尔主义认识论还有多远？如果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批判是建立在认识论问题之上的，而如果我们认为马赫卢普的解读是合理的，这些问题就变得毫无根据，那么就需要修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后波普尔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关系。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经验实验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但在波普尔-库恩-拉克托斯-费耶阿本德辩论之后，经验实验是否是评估科学理论的正确方法还不是很清楚。波普尔认为，没有可以独立于理论的数据分析，引入了充满理论的问题；即，只有假设要检验的假设，检验才有意义。例如，经济指标是在给定的理论框架内建立的：受凯恩斯主义启发的宏观经济学。使用受凯恩斯主义启发的指标，对一个凯恩斯主义模型进行经验验证可以提供多大的置信度？或者，使用受凯恩斯主义启发的指标，对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经验性拒绝可以提供多大的置信度？是理论首先指出了哪些数据应该被视为相关数据，并且由于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被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所搁置，因此与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等理论相关的适当经济指标并不容易获得。这一事实，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方面没有在非奥地利学派模型中找到一席之地，并没有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变得错误，正如它也没有使这些模型变得不完整。

此外，Kuhn (1962)认为，数据诠释——不仅仅是数据选择——取决于不同范式中的理论内容，并且，相同的术语对不同的科学家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

西。²⁸库恩认为，经验检验可能在一个范式内起作用，但不能解决来自不同范式的理论之间的争议，因为检验需要将范式视为理所当然；因此，范式是不可检验的。并且，是范式定义了什么是有趣的问题，以及什么被认为是一个科学的答案。

Lakatos (1978) 认为，科学家们接受了一个被假设保护带包围的原子核。正如马赫卢普所假设的那样，这对经济学中的验证问题提出了挑战，因为一个理论不能独立于经验假设进行检验。确定哪个假设失败了不仅是一个问题；同样的挑战是这一事实，即一些假设是不可观察的。例如，正如 Lachmann (1943) 和 Mises (1943) 所讨论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假设预期在利率变化方面以特定方式表现；但是，预期是无法被观察的。

Feyerabend (1975) 然后得出结论，因为硬核被认为是给定的，所以科学家之间的相互说服不是通过经验测试，而是说服和批判性讨论。²⁹在范式之间的辩论中，每个群体都使用自己的范式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每种范式所采用的基本假设不同，经验证据无法在范式之间做出决定。科学家需要诉诸说服力。科学家们必须处理的是理论与理论，而不是理论与数据。

当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并不倾向于使用经验数据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方式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但他们的经验工作与马赫卢普的例释和哈耶克的模式预测一致，并且，并不像受罗斯巴德式解读影响的批评所暗示的那样远离后波普尔主义认识论。

如果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可以在后波普尔主义认识论中被框定，那么作为两种不同范式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可以说什么呢？

3.2.2.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范式

Mises (1949, 38) 以几何为例来为先验推理辩护：“所有几何定理都已蕴涵在那些公理里。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概念，已经包含了毕达哥拉斯的定理。这一定理是一句同义反复语，它的演绎导致一个分析的判断。尽管如此，没有人会争辩说，从一般的角度说的几何学，和从特定的角度说的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不会增进我们的知识。”米塞斯使用几何作为例子提供了一个简单但微妙的案例来代表他的认识论立场。他的例子不准确；几何没有脱离经验内容，因此不是纯粹的同义反复。³⁰

²⁸ 参见 Horwitz (2000) 和 Thomsen (1992)。

²⁹ 参见 McCloskey (1983, 489)：“无论好坏，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革命都不会在推荐用于科学方法的现代主义立法下发生。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凯恩斯主义的见解才被表述为统计命题，那是在大多数年轻经济学家被说服之后。”但也可参见 Caldwell and Coats (1984) 对 McCloskey 的评论。

³⁰ 米塞斯并不是说经济学就像几何。相反，他使用几何例子来捍卫先验推理的有效性。参见 Mises (1962, 5)：“行动学不是几何学。假设一个知识分支的认识论特征必然适用于任何其他分支，这是所有迷信中最糟糕的。在处理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时，绝不能从几何学、力学或任何其他科学中得到启示。”Hoppe (1995) 也使用了几何例子。

在欧几里得几何中，我们从经验中先验地知道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 180 度。然而，这个结果在非欧几里得几何中并不成立。欧几里得几何和非欧几里得几何之间的区别在于假定的表面类型：平面产生欧几里得几何，非平面产生非欧几里得几何。但是表面的类型并不是先验知道的：它要么被观察到，要么被假设。³¹尽管如此，如果三角形内角的测量值不等于 180 度，一个人不会主张反驳欧几里得几何。在得出欧几里得几何已被证伪的结论之前，任何形式的解释都将被接受。引入假设的现实世界条件不会影响经济学的先验特征，就像表面类型的假设不会改变几何的先验特征一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动学和几何学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一组必然为真的先验范畴加上作为经验假设的平面。几何的例子把经验假设从何而来的问题摆上了桌面。在几何的情况下，它可以从观察中推断或者假设。³²然而，在米塞斯那里，两者都不是：有目的的行为——自由意志——的假设来自于内在而非外在的观察。³³人的行动的概念可以在哲学人类学领域进行讨论，而不是在经验检验领域。

几何的例子还允许一个人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并列放置。如果不同拉卡托斯核心是不同库恩范式的基础，那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就像两种经济几何学，它们将不同类型的表面作为其硬核的一部分。例如，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之间的区别。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共享相同的范式或世界经济几何观（非奥地利学派范式中的两个子范式），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通过具有不同经济几何的眼镜来看待世界。³⁴这就是为什么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交流比他们和奥地利主义者之间的交流更容易的原因。³⁵

³¹ 欧几里得几何是一个例子，说明观察如何通过让人们假设地球是平的而不是曲面的来误导理论。经验观察不是理论的安全锚。地球作为宇宙的中心可能是另一个例子。恒星和行星被“看到”围绕地球运动。

³² 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宇宙类型是假设的，而不是观察到的。在天体物理学中，表面的类型是根据理论是假设宇宙仍在无休止地膨胀还是会聚成大紧缩来选择的。参见 Devlin (1988, 199)。

³³ 参见 Mises (1933, 15): “我们对人及其行为的思考【……】【暗示】经济行动的概念【不能不参考】经济数量关系和经济财货概念。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这些概念是否适用于我们生活必须实际生活的条件下的任何事物。【……】然而，不是经验，而是先于经验的理性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财货，什么是经济财货。”

Mises (1949, 39–40): “行动学的出发点不是选择公理和决定程序方法，而是反思行动的本质。不存在行动学范畴没有完全和完美地出现的行动。不能想象这样一种行动模式，其中手段与目的或成本与收益无法明确区分和精确分离。”

³⁴ Smith (1990) 使用欧几里得和非欧几里得几何例子来坚持认为可能存在一种“非欧几里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个想法可能适用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例如无政府资本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者，或 100%准备金与部分准备金之争。

³⁵ 这与 Bronfenbrenner (1971) 所持有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范式发生了变化。只要凯恩斯之前和之后的基本假设保持不变，那么范式就保持不变，尽管在凯恩斯之后的保护带中存在潜在的新辅助假设或新的临时假设。由于区分核心假设和辅助假设并不容易，因此发现依赖于基本假设的范式也是一种诠释和说服练习。对于比较两种范式方法的论述，另见 Boettke (1997)、Kohn (2004) 和 Rosen (1997)。

这使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与通常采用的不同。首先，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样先验；不同的是（1）什么被认为是先验的；（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逻辑实证主义态度比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少得多。然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并不反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先验主义，然后转向经验实验，看看需求曲线是否向下倾斜。一位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声称他已凭经验驳斥了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之前，会寻找任何其他可能的诠释。但这也意味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批评者不应该反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先验术语本身。

其次，由于奥地利学派和非奥地利学派在不同的范式下工作，这些范式基于一组不同的不可观察的基本假设，所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不是或不应该是经验主义的，而是基础性的。潜在的问题是，哪种经济几何——奥地利学派的、非奥地利学派的或第三种经济几何——更合理地反映了现实世界。这不是一个可以凭经验解决的问题，因为这需要假设某些经验条件成立，这与批评米塞斯极端先验版本的立场完全相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归结为通过经验工作进行的说服行使，这种行使说明了每种范式是如何运作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坚持经济理论中使用的假设是真实的，这绝非偶然。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区分属于硬核的假设或属于辅助假设的假设并不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有人可能会反对，虽然奥地利学派可以将经济学的经典传统诠释为研究自发秩序的延续，但非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意味着向新经济学的范式转变，因此经济科学已经向前发展。³⁶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范式是建立在毫无疑问的基本假设之上的，其中一些假设可能无法观察到，而且范式转变是说服行使的结果，而不是决定性经验测试的结果，因此没有任何东西保证了范式的改变是朝着真实反映经济现象迈出的一步；这也可能意味着退后一步。

如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可以被诠释为古典自发秩序传统的延续，如果经济学的先验特征不是米塞斯的发明，那么他的贡献是什么？³⁷再次以几何为例，米塞斯对经济认识论的贡献与欧几里得的贡献相似。米塞斯的认识论在于为经济认识论提出一种终极给定（ultimate given）——有目的的行为。他在将有目的的行为确定为终极给定方面可能是对的或错的，但这就是他与那些打算将经济学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而没有一个明确的先验终极给定的人不同之处。³⁸

可以扩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以阐明这一点。Leeson (2012, 189)认为 Becker (1976, 1993)的方法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方法相似。Becker (1993, 386)断言经济“分析假设个人在他们的设

³⁶ 关于古典-奥地利学派自发秩序传统，参见 Gallo (1987)和 Horwitz (2001)。

³⁷ J. S. Mill, Cairnes, Menger 和 Robbins 等经济学家将这门学科视为先验练习。对于 Mises (1933, 第 1 章)来说，经济学的先验特征是该学科的普遍立场。

³⁸ 参见，例如，Senior (1850, 2-3): “【经济】前提由极少数的一般命题、观察的结果或意识组成，几乎不需要证明，甚至不需要正式陈述，几乎每个人一听到它们，就会承认他很熟悉它们，或者至少它们包括在他以前的知识中；他的推论几乎和他的前提一样普遍，而且，他的推论几乎和他的前提一样普遍和确定——如果他的推理是正确的。”

想中最大化福利，无论他们是自私的、利他的、忠诚的、恶意的还是自虐的”，这听起来非常奥地利学派。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需要加以区分，那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使用的理性概念。这种乍一看似乎微不足道的差异，是一种可能导致沟通障碍的分歧，也是为什么辅助假设的变化被一种范式认为是合理的但被另一种范式视为临时立场的原因。毕竟，理性定义了经济主体所接受的行为。³⁹换句话说，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产生相似的结果，米塞斯的经济几何与贝克尔的经济几何也不同，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在一小块曲面中可能是一种足够好的近似，但不能准确地适应更大的规模。

3.2.3. 理论作为经济现象的例释

Horwitz (2012)讨论了经验工作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作用。然而，霍维茨并没有像我们上面所做的那样，在马赫卢普的工作或后波普尔主义认识论的背景下呈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经验。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马赫卢普和米塞斯所设想的经济理论的例释性特征。⁴⁰

Boettke (2005)将关于自治的文献确定为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项进步研究计划。该文献应用奥地利学派和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观点来说明自治的内生机制如何在没有像国家这样的中央权威存在的情况下产生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些应用案例包括对17世纪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内生规则的研究、1991年国家崩溃后索马里等无政府国家的经济秩序研究以及支配海盗等犯罪分子之间社会交往的非正式规则的出现。⁴¹该文献利用了哈耶克自发秩序的一般原则，以及针对所研究案例的不同经验假设。在这个研究项目中工作的作者也看到了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的作品中奥地利学派和哈耶克的想法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的类似应用。虽然在这些不同的应用中存在共同假设的核心，但特定的假设条件会根据需要而变化。本文献中的方法是使用案例研究作为所用理论的例释。

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新唤起了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 (ABCT) 的兴趣。⁴²然而，ABCT可以追溯到 Mises (1912)。Hayek (1931, 1933) 和 Robbins (1934)使用 ABCT 来挑战凯恩斯解释大萧条的理论。从1912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可以预料，如果要将理论应用于现代事件，则需要修改一些原始的经验假设。Callahan and Horwitz (2010)认为，ABCT基于普遍性水平不同的假设和理想类型。例如，ABCT的正

³⁹ Becker (1962, 1963) 和 Kirzner (1962, 1963) 之间的交流，体现了在趋向于均衡以及理性和学习的作用方面的不同立场。此外，Becker (1963, 83) 建议“行动学和其他关注确定个人理性程度的人可能会在未来投入更多时间来制定和进行相关测试”，这体现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非奥地利学派批评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

⁴⁰ Evans and Tarko (2011)回顾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当代工作。

⁴¹ Boettke (2010, 2011), Leeson (2006, 2007a, 2007b, 2008, 2009a, 2009b), B. Powell and Coyne (2003), B. Powell, Ford and Nowrasteh (2008)和 Stringham (2002, 2003)。有关该主题研究的评论，请参见 B. Powell and Stringham (2009)。

⁴² 参见 Borio and Disyatat (2011), Caballero (2010), Calvo (2013), Diamond and Rajan (2009), Hume and Sentence (2009), Leijonhufvud (2009)和 White (2009)。有关 ABCT 与其他经济周期理论的比较，请参见 Sechrest (1997)和 Shah (1997)。

典版本假定了金本位，并且没有谈及风险敞口，这一问题被确定为 2008 年危机的一个关键方面。Cachanosky (2012a)和 Young (2012) 提供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不同版本，其中修改了关于货币制度和风险的假设条件，将理论更新为当代市场条件。通过假设法定货币和汇率而不是国际金本位制，Cachanosky (2012b)和 Hoffmann (2010)提供了 ABCT 的国际应用，比 ABCT 的正典版本更适合 2008 年危机的事件。Young (2012)修改了 Garrison (2001)的 ABCT 模型，以明确说明风险，并将该理论更好地应用于导致 2008 年危机的事件。这些修改是基于假设的条件，而不是理论的核心，这些版本的 ABCT 是一个主题的变体，而不是替代理论。

3.3. 如果马赫卢普的诠释受到更多关注会怎样？

我们推测，如果马赫卢普的诠释得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那么奥地利学派平行经济世界不会失去其重要性，并且，两种范式之间本可以从交换中获得更多收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后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诸如社会主义下的经济计算问题、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等核心辩论中的关键作用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尤其是在 1974 年奥地利学派复兴之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本来可以更有成效。像这样的案例浮现在了脑海中：博弈论发展的主角奥斯卡·摩根斯坦（米塞斯的学生），或者在 Robbins (1932)关于经济科学本质的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强大的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如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效仿马赫卢普而不是罗斯巴德，他们的经济方法就不会被认为太奇特而不能被认真对待。

但是，我们担心这个平行的奥地利学派世界无法避免两个问题。一是与 1955 年盛行的科学哲学的冲突；那是 Hempel、Nagel 和 Friedman 的时代，他们的重点是验证背景。波普尔（1935）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拉本德的辩论甚至还没有开始。其次，与当代经济学中仍然存在的逻辑实证主义发生的冲突。⁴³正是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序列显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问题。马赫卢普领先于他的时代，这在 1955 年可能是个问题。

米塞斯不是如罗斯巴德定义的、被布劳格嘲笑的极端先验主义思想家，而是贝克尔经济学看待人的行动的另一个例子。米塞斯的立场可能被认为具有挑战性，但并非不可接受。所谓的米塞斯主义者和哈耶克主义者之间的分离不会发生。将米塞斯解读为哈耶克主义者，将哈耶克解读为继续米塞斯研究计划的米塞斯主义者会更自然。马赫卢普的拉卡托斯结构将允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进行对话并展示他们的工作，而不是被视为分化的两极。⁴⁴

⁴³ 参见 Caldwell (1980, 1984b, 2013)。

⁴⁴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联系是现象学、诠释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尽管我们无法在本文中讨论。Machlup (1955) 在基本假设的哲学基础上明确引用了韦伯和舒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马赫卢普对舒茨的态度本可以避免罗斯巴德和拉沃伊的追随者之间的分离。参见 Zanotti (2007)。

4. 结论

认真考虑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诠释可以替代罗斯巴德的诠释，其含意不仅在于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马赫卢普的诠释提出了两个挑战。首先，重新评估在经济学中应该被理解为先验的东西。罗斯巴德的极端先验主义即使不是自相矛盾的，也已经过时了。其次，即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没有陷入逻辑实证主义转向，也不应该放弃用后波普尔主义术语来表述奥地利学派认识论的尝试。正如我们在本文中试图表明的那样，站在错误的认识论肩膀上会产生重大后果。由于罗斯巴德主义的影响和重建马赫卢普已经完成的工作的需要，最近将拉卡托斯应用于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尝试失败了或者说不符合标准。

对于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马赫卢普表明，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先验主义为由批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会招致同样的批评。费耶阿本德关于这种态度的讽刺段落应该是一个警告。如果马赫卢普对米塞斯的诠释被认为是合理的，那么布劳格代表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共同态度的段落就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用同样过时和站不住脚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来批评罗斯巴德过时且站不住脚的极端先验主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就不会产生丰硕的成果。非奥地利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者可能想批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但他们不能以遵循一种古老且不再被接受的科学哲学为由批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一旦考虑到这些含意，并且一旦两种范式的主角能够理解它们为什么以及如何不同，那么就可以从知识交换中获得收益。一旦承认没有理论的经验证据，只有理论的经验例释，并且潜在的争论是哪种范式对经济现象提供了更合理的描述，马赫卢普的例释和哈耶克的模式预测可以成为范式间说服的工具。

5. 参考文献

Artigas, M. (1998). *Lógica y Ética en Karl Popper*. Pamplona: Universidad de Navarra.

Backhouse, R. E. (2000).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Mainstream: View from the Boundary.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3(2), 31–43.

Becker, G. S. (1962). Irrational Behavior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1), 1–13.

Becker, G. S. (1963). Rational Ac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A Reply to I. Kirzn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1(1), 82–83.

Becker, G. S.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G. S. (1993).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3), 385–409.

Bird, A. (2008). The Histo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S. Psillos & M. Curd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Blaug, M. (1980).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 (199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ock, W. E. (1999). Austrian Theorizing: Recalling the Found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4), 21–39.

Block, W. E. (2003). Realism: Austrian v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Reply to Capla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6(3), 63–76.

Boettke, P. J. (1997). Where did Economics go Wrong? Modern Economics as a Flight from Reality. *Critical Review*, 11-64(1), 11.

Boettke, P. J. (2005). Anarchism as a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 in Political Economy. In E. P. Stringham (Ed.), *Anarchy, State and Public Choice* (pp. 206–219).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Boettke, P. J. (2010). Is the only form of “reasonable regulation” self regulation?: Lessons from Lin Ostrom on regulating the commons and cultivating citizens. *Public Choice*, 143(3-4), 283–291. doi:10.1007/s11127-010-9622-9

Boettke, P. J. (2011). Anarchism and Austrian Economics. *New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Economy*, 7(1), 125–140.

Boettke, P. J., & O'Donnell, K. W. (2013). The Failed Appropriation of F. A. Hayek by Formalist Economic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doi:10.2139/ssrn.2336805

Boland, L. A. (1979). A Critique of Friedman's Cr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VII(June), 503–522.

Borio, C., & Disyatat, P. (2011).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Link or no Link? Basel.

Bronfenbrenner, M. (1971). The “Structure of Revolutions” in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1), 136–151. doi:10.1215/00182702-3-1-136

Caballero, R. J. (2010). Macro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 Time to Deal with the Pretense- of-Knowledge Syndrom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4(4), 85–102. doi:10.1257/jep.24.4.85

Cachanosky, Nicolas. (2012).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The Cases of Colombia and Panama (2002-2007).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doi:10.2139/ssrn.2170566

Cachanosky, Nicolás. (2012). The Mises-Hayek business cycle theory, fiat currencies and open economies.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doi:10.1007/s11138-012-0188-2

Caldwell, B. J. (1980a). A Critique of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7(2), 366–374.

Caldwell, B. J. (1980b). Positiv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XIV(1), 53–76.

Caldwell, B. J. (1984a). Praxeology and its Critics: An Apprais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6(3), 363–379.

Caldwell, B. J. (1984b). Some Problems with Falsification in Economic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4, 489–495.

Caldwell, B. J. (2004). *Hayek's Challe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ldwell, B. J. (2009). A skirmish in the Popper Wars: Hutchison versus Caldwell on Hayek, Popper, Mises, and method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6(3), 315–324. doi:10.1080/13501780903129306

Caldwell, B. J. (2013). Of Posi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79(4), 753–767.

Caldwell, B. J., & Coats, A. W. (1984). The Rhetoric of Economists: A Comment on McClosk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2(2), 575–578.

Callahan, G., & Horwitz, S. G. (2010). The Role of Ideal Types in 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14(2010), 205–224. doi:10.1108/S1529- 2134(2010)0000014013

Calvo, G. A. (2013). Puzzling Over the Anatomy of Crises: Liquidity and the Veil of Fina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lumbia.edu/~gc2286/documents/CalvoBOJpaperMay2013REVJune282013.pdf>

- Caplan, B. (1999). The Austrian Search for Realistic Foundation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5(4), 823–838.
- Caplan, B. (2001). Probability, Common Sense, and Realism: A Reply to Hulsmann and Block.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4(2), 69–86.
- Caplan, B. (2003). Probability and the Synthetic A Priori: A Reply to Block.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6(3), 77–83.
- Carrier, M. (2012). Historical Approaches: Kuhn, Lakatos and Feyerabend.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 Thinkers*.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 Champion, R. (2011). Defence of Fallible Apriorism. *Nuova Civiltà delle Machine*, 1-2, 69– 88.
- Devlin, K. (1988). *El Lenguaje de las Matemáticas*. (P. Crespo, Trans.) (2002nd ed.). Barcelona: Ediciones Reinbook.
- Di Iorio, F. (2008). Apriorism and Fallibilism: Mises and Popper on the Explanation of Action and Social Phenomena. *Nuova Civiltà delle Machine*, xxvi(4), 5–32.
- Diamond, D. W., & Rajan, R. G. (2009). *Illiquidity and Interest Rate Policy*. Cambridge.
- Doherty, B. (2007). *Radicals for Capital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Egger, J. B. (1978). The Austrian Method. In L. M. Spadaro (Ed.), *New Directions i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 Evans, A. J., & Tarko, V. (2011). Contemporary Work in Austrian Economic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doi:10.2139/ssrn.1875966
- Feyerabend, P. (1975). *Against Method* (2010th e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Gallo, E. L. (1987). La Tradición del Orden Social Espontáneo: Adam Ferguson, David Hume y Adam Smith. *Libertas*, 4(6).
- Garrison, R. W. (2001). *Time and Money.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 (M. J. Rizzo & L. H. White, Eds.) (200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ayek, F. A. (1931). *Prices and Production* (1967th e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Hayek, F. A. (1933).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N. Kaldor & H. M. Croome, Trans.). New York: Sentry Press.

- Hayek, F. A. (1948).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1958th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mpel, C. (2010).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In F. Guala & D. Steel (Eds.),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Reader*. Routledge.
- Hirsch, A. (1980). The “Assumptions” Controvers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XIV(1), 99–118.
- Hoffmann, A. (2010). An Overinvestment Cycl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etroeconomica*, 61(4), 711–734. doi:10.1111/j.1467-999X.2010.04103.x
- Hoppe, H. H. (1995). *Economic Science and the Austrian Method* (2007th ed.).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 Horwitz, S. G. (2000).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economics: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2003r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orwitz, S. G. (2001). From Smith to Menger to Hayek. Liberalism in the Spontaneous- Order Tradition. *The Independent Review*, 6(1), 81–97.
- Horwitz, S. G. (2012). The Empirics of Austrian Economics. *Cato Unbound: A Journal of Debate*, (Septemb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cato-unbound.org/issues/september-2012/theory-practice-austrian-school>
- Hülsmann, J. G. (1999). Economic Science and Neoclassic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4), 3–20.
- Hülsmann, J. G. (2003). Facts and Counterfactuals in Economic Law. *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17(1), 57–102.
- Hume, M., & Sentance, A. (2009). The global credit boom: Challenges for macroeconomics and poli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8(8), 1426–1461. doi:10.1016/j.jimonfin.2009.08.009
- Hutchison, T. W. (1938). *Significance and Basic Postulates of Economic Theory* (1965th ed.). Augustus M. Kelley.
- Kirzner, I. M. (1962). Rational Ac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4), 380–385.
- Kirzner, I. M. (1963). Rational Ac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Rejoind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1(1), 84–85.
- Kirzner, I. M. (1976). On the Method of Austrian Economics. In E. Dolan (E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City: Sheed and Ward, Inc.

- Kohn, M. (2004). Value and Exchange. *Cato Journal*, 24(3), 303–339.
- Koppl, R. G. (2002). *Big Players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Expect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96th e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chmann, L. M. (1943). The rôle of Expectations in Economics as a Social Science. *Economica*, 10(37), 12–23.
- Lakatos, I.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J. Worral & G. Currie, Eds.) (1999th ed.,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lois, R. N., & Koppl, R. G. (1991). Fritz Machlup and Marginalism: a Reevaluation. *Methodus*, 3(2), 86–102.
- Lavoie, D. C. (1986). Euclideanism versus Hermeneutics: A Re-integration of Misesian Apriorism. In I. Kirzner (Ed.), *Subjectivism, Intelligibility and Economic Understanding*. Palgrave Macmillan.
- Lavoie, D. C. (2011). The interpretive dimension of economics: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eology.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4(2), 91–128. doi:10.1007/s11138-010-0137-x
- Leeson, P. T. (2006). Efficient anarchy. *Public Choice*, 130(1-2), 41–53. doi:10.1007/s11127-006-9071-7
- Leeson, P. T. (2007a). An-arrgh-chy: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Pirat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5(6), 1049–1094. doi:10.1086/526403
- Leeson, P. T. (2007b). Better off stateless: Somalia before and after government collap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5(4), 689–710. doi:10.1016/j.jce.2007.10.001
- Leeson, P. T. (2008). How Important is State Enforcement for Trade?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10(1), 61–89. doi:10.1093/aler/ahn003
- Leeson, P. T. (2009a). The Laws of Lawlessnes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8(2), 471–503. doi:10.1086/592003
- Leeson, P. T. (2009b). The calculus of piratical consent: the myth of the myth of social contract. *Public Choice*, 139(3-4), 443–459. doi:10.1007/s11127-009-9403-5
- Leeson, P. T., & Boettke, P. J. (2006). Was Mises right?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64(2), 247–265. doi:10.1080/00346760600721163

- Leijonhufvud, A. (2009). Out of the Corridor: Keynes and the Cri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3(4), 741–757. doi:10.1093/cje/bep022
- Lewin, P. (1997). Hayekian Equilibrium and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4(2), 245–266. Retrieved from <http://www.utdallas.edu/~plewin/Equil.html>
- Machlup, F. (1955). The Problem of Verification in Economic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2(1), 1–21.
- Maclean, G. (1980). Fritz Machlup's Quasi-Subjectivism: An Unease Marriage Betwee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Logical Empirism. *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 14(1), 83–93.
- McCloskey, D. (1983).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1(2), 481–517.
- Mises, L. von. (1912).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H. E. Batson, Trans.) (1981st ed.).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 Mises, L. von. (1933).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2003rd ed.). Auburn: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 Mises, L. von. (1943). “Elastic Expectations” and the Austrian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 *Economica*, 10(39), 251–252.
- Mises, L. von. (1949). *Human Action* (1996th ed.). Irvington-on-Hudson: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mises.org/document/3250>
- Mises, L. von. (1962).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 Musgrave, A. (1981). “Unreal Assump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The F-Twist Untwisted. *Kyklos*, 34(3), 377–387.
- Nagel, E. (1963). Assump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2), 211–219.
- Nola, R., & Sankey, H. (2000). *After Popper, Kuhn and Feyerabend: Recent Issues in Theories of Scientific Metho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Nozick, R. (1977). On Austrian Methodology. *Synthese*, 36(3), 353–392. Retrieved from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BF00486025>
- Popper, K. R. (1935).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200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Popper, K. R. (1957).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200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Popper, K. R.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200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Powell, B., & Coyne, C. J. (2003). Do Pessimistic Assumptions about Human Behavior Justify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17(4), 17–37.
- Powell, B., Ford, R., & Nowrasteh, A. (2008). Somalia after state collapse: Chaos or improv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67(3-4), 657–670. doi:10.1016/j.jebo.2008.04.008
- Powell, B., & Stringham, E. P. (2009). Public Choice and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Anarchy: A Survey. *Public Choice*, 140, 503–538. doi:10.1007/s11127-009-9407-1
- Powell, B. W., & Stringham, E. P. (2012). Radical Scholarship Taking on the Mainstream: Murray Rothbard's Contribution.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5(4), 315–327. doi:10.1007/s11138-011-0167-z
- Rizzo, M. J. (1978). Praxeology and Econometrics: A Critique of Positivist Economics. In L. M. Spadaro (Ed.), *New Directions in Austrian Economics* (pp. 40–56).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 Rizzo, M. J. (1982). Mises and Lakatos: A Reformulation of Austrian Methodology. In I. M. Kirzner (Ed.), *Method, Process, and Austrian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1983rd ed.).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Retrieved from <http://mises.org/books/methodprocess.pdf>
- Robbins, L. (1932). *An Essay on the Nature &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Science (1945th e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 Robbins, L. (1934). *The Great Depression* (1971st ed.). Freeport, New York: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 Rosen, S. (1997). Austrian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y Gains From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 139–152.
- Rothbard, M. N. (1951). Praxeology: Reply to Mr. Schulle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1(5), 943–946. doi:10.1126/science.151.3712.867-a
- Rothbard, M. N. (1957). In Defense of “Extreme Apriorism.”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3(1), 314–320.
- Rothbard, M. N. (1976). Praxeology: The Method of Austrian Economics. In E. G. Dolan (E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City: Sheed and Ward, Inc.

- Sarjanovic, I. A. (2008). Popper y los Austriacos: Atando Cabos. *Revista de Instituciones, Ideas y Mercados*, 48(Mayo), 17–32.
- Schütz, A. (1953). Common-Sense and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Actio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IV(1), 1–38.
- Schütz, A.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Schütz, A., & Wagner, H. R. (1970).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chrest, L. J. (1997). Austrian and Monetarist Business Cycle Theorie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4, 7–31.
- Selgin, G. A. (1990). *Praxeology and Understanding*. Auburn: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mises.org/books/prax-and-understanding.pdf>
- Senior, N. W. (1850). *Political Economy* (1854th ed.). London and Glasgow: Richard Griffin and Co.
- Shah, P. J. (1997). The Theory of Business Fluctuations: New Keynesians, Old Monetarists, and Austrians.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4, 33–62.
- Smith, B. (1990). On the Austriannes of Austrian Economics. *Critical Review*, 4(1-2), 212–238.
- Stringham, E. P. (2002). The Emergence of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as a Self-Policing Club. *Journal of Private Enterprise*, 17(2).
- Stringham, E. P. (2003). The extralegal development of securities trad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Amsterdam.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3(2), 321–344. doi:10.1016/S1062-9769(02)00153-9
- Stringham, E. P., & Gonzales, R. (2009). The Role of Empirical Assumptions in Economic Analysis: On Facts and Counterfactuals in Economic Law.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et des Etudes Humaines*, 15(1), 1–11. doi:10.2202/1145-6396.1218
- Stuart Mill, J. (1848).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ume III -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Books III- V and Appendices)*. (J. M. Robson, Ed.) (1965th ed.). Toront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nd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Thomsen, E. F. (1992). *Prices & Knowledge*. (M. J. Rizzo & L. H. White, Eds.) (200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White, W. R. (2009). Modern Macroeconomics Is on the Wrong Track. *Finance & Development*, December, 15–18.

Yeager, L. B. (1997). Austrian Economics, Neoclassicism, and the Market Tes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 153–165.

Young, A. T. (2012). 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 A Modern Appraisal. In P. J. Boettke & C. J. Coyne (Eds.), *Oxford Handbook of Austrian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anotti, G. J. (2006). Feyerabend en Serio. In M. Dolfi (Ed.), *Homenaje a Alberto Moreno* (Eudeba., Vol. V). Buenos Aires.

Zanotti, G. J. (2007). Intersubjectivity, Subjectivism,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Markets & Morality*, 10(1), 115–141.

Zanotti, G. J. (2009). Thomas Kuhn: el paso de la racionalidad algorítmica a la racionalidad hermenéutica. *Revista de Análisis Institucional*, 3, 1–56.

Zanotti, G. J. (2011). *Conocimiento versus Información*. Madrid: Union Editorial.